

中国传统方志 艺文志研究

马春晖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中国传统方志艺文志研究

马春晖 著



责任编辑：金丽萍

封面设计： www.zix.com.cn

中国
传统方志
艺文志研究



ISBN 978-7-5013-5518-1

9 787501 355181 >

定价：60.00 元

序 言

中国是世界上罕见的方志编纂大国。有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总共收录国内180多个单位所藏方志8200多种。由金恩辉、胡述兆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以后陆续出版）更进一步，这套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收录古代至1949年旧方志8577种，下部收录1949—1999年新编方志3402种。

在中国传统文献大家庭中，地方志是颇具个性的重要文献。它不仅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且与另外两种文献——正史、家谱，共同支撑起中华民族文献大厦，被誉为中国史学领域里鼎足而立的“三大支柱”。“三大支柱”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正史是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有关历史情况的信息资源，家谱是反映社会基层细胞一定时期内有关历史情况的信息资源，而地方志则是反映一定地域一定时期内有关历史情况的信息资源。比较“三大支柱”之三种文献，方志体例尤似正史。特别是反映文献专篇的艺文志，相似之中又有区别：正史艺文志专纪一国之文献，方志艺文志仅纪一地之文献。

考察地方志基本体例，“艺文志”起码在三个方面显示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第一，地方志的编撰具有不间断的连续性，这就意味着依附于它的“艺文志”的永无穷期，意味着为后人研究相关文献提供了永不消失的开放窗口。第二，方志艺文志旨在反映一定时期内有关某一地域藏书之盛或著述之盛，这不仅提升了方志的含金量，也扩大了地方志的学术地位和影响。第三，同正史艺文志一样，方志艺文志也是治学和著述的门户。如果说“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则方志艺文志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揭示与报道，同样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检索平台。

虽然方志艺文志的意义重大，但存在其中的诸多缺憾也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地方志属于官修文献，反映统治阶层正统观念是其一贯的指导思想，这一特征也不可避免地体现于艺文志中。其次，艺文志的文献著录也存在许多问题。阅读马春晖著作，即可略窥一斑：其一，良莠不齐。艺文志中固然收录

不少颇有价值的作品,但是也有附庸风雅、无病呻吟之作。例如道光间张道超《伊阳县志》,其中就有这类问题。其二,比例失调。艺文志仅为方志体例之一,但有些方志艺文志没有全局观念,大量堆砌诗文,所占篇幅极不相称。例如明嘉靖间《四川总志》八十卷,而自十七卷以下皆为《全蜀艺文志》。其三,张冠李戴。有些艺文志信手误收,不加考证,实在贻害后人。例如南阳《卧龙冈志》,本意收录古人歌咏南阳“隆中”诗,却误收了歌咏湖北襄阳之“隆中”诗。其四,疏于核校。例如《全唐诗》三百三十七卷韩愈《峋嵝山》:“蝌蚪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而在《衡州府志·艺文志·三七言古诗》中,题名居然成为《峋嵝峰》,“虎螭”也变成了“蛟螭”。这种情形并非个案。此外,理论研究问题非常突出。古代学者中,唯章学诚有理论又有实践,对艺文志建树最为突出。其余大都浅尝辄止,不成系统。近代以降,学界有一普遍现象,多数人以“序”“跋”“例言”或书札信函等形式,反映个人对艺文志的片面认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朱士嘉、傅振伦、王重民等学者在致力方志研究时,都不同程度地涉猎了艺文志理论问题。继之而起的王欣夫、仓修良等人显然更进一步,他们甚至在著作中特辟专章研究方志艺文志。但是方志艺文志毕竟是一篇大文章,所涉事项纷繁复杂,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换言之,无论是出版有关方志艺文志的专著,还是发表有关方志艺文志的论文,依然是目前方志领域中翘首以盼的喜讯。

马春晖博士长期关注方志艺文志的研究,还在攻读学位期间即将其确定为研究方向,填补了国内博士论文的空白。在撰写本书过程中,作者以国家图书馆为重要基地,对古今方志艺文志做了艰苦细致的摸底排查,涉及的明、清、民国、新中国四个时期的方志艺文志文献达到3500多种。在《中国传统方志艺文志研究》中,作者界定了方志艺文志相关概念,以七个阶段系统反映了传统方志艺文志的发展轨迹,对方志艺文志的内容、体例及相关研究一一论列,并在肯定方志艺文志作用和解析相应缺失的基础上,指出传统方志艺文志对新编方志的启迪作用和重要参考价值。

毋庸置疑,传统方志艺文志是一个相当专业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选题。《中国传统方志艺文志研究》是作者艰苦劳动的结晶,无论在相关理论的研究方面,还是在资料的梳理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当然,为了更加适应当今形势下新方志编写工作的需要,作者还应该在原来基础上再接再厉,尤其在艺文志的理论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马春晖博士的著作于马年问世,我以为起码有两项意义:一是本书问世

序　　言

后,相信对新方志的编修工作一定会有所裨益。二是本书问世后,或许还会对该领域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可以期待:如果本书出版后,真的“引”起了更多学人关注艺文志的研究,真的“引”出了许多更高水平的艺文志论著,那将是学界的一件幸事。

王锦贵
甲午年春节于北京中海枫莲山庄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方志艺文志的基本理论	(7)
第一节 方志	(7)
第二节 艺文志	(23)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	(29)
第四节 方志艺文志与正史艺文志	(32)
第五节 方志学与目录学	(41)
第二章 方志艺文志的发展沿革	(46)
第一节 萌芽阶段	(46)
第二节 发育成型阶段	(53)
第三节 沿袭阶段	(65)
第四节 发展阶段	(70)
第五节 鼎盛阶段	(79)
第六节 嬗变阶段	(116)
第七节 新艺文开篇	(127)
第三章 方志艺文志解析	(135)
第一节 艺文内容	(135)
第二节 艺文体例	(143)
第三节 艺文著录	(153)
第四节 艺文编次	(156)
第四章 方志艺文志的价值	(160)
第一节 展示地方学术成果的平台	(160)
第二节 记录地方史料的载体	(175)
第三节 抒发乡曲乡情的媒介	(187)

第五章 方志艺文志的评价与展望	(192)
第一节 方志艺文志之弊病	(192)
第二节 方志艺文志之评论	(196)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之研究成果(清、民国)	(204)
第四节 新方志艺文志之镜鉴	(224)
余 论	(229)

绪 论

方志艺文志，顾名思义，是指我国传统文献方志之中的艺文门类，又称艺文略、文艺考、典籍志、经籍志等。它来源于一地的图经、档案、牒谱、传志、碑碣、钟鼎、笔记、信札以及逸闻逸事等原始材料，专门展现一地的著作名称、著者、成书年代、序跋、内容提要及记载诗文、奏疏、金石碑刻等内容，阅读艺文志可了解一地的图书文献、学术源流及文化发展情况。

我国拥有千年一贯的正史，艺文志是构成正史的重要内容，亦称经籍志，以东汉《汉书·艺文志》为发端，到唐初魏徵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而趋于完善。二十四史中有艺文志者有六部，包括《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①，其他史付之阙如。后经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穷年累月、铢积寸累地补苴，又出补史艺文志六十余种，凡是设有艺文志的朝代，都有学者前赴后继、精心考核补撰艺文志。这些补遗成果和原有的正史艺文志大体反映了我国近两千年来的系统厘然的典籍记载，从这些记载当中，可以明了各个时期学术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概况。郭沫若曾指出“历代史书多‘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②。如：《新唐书·艺文志》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记载了李唐时代的国家藏书之盛。正史艺文志构成了我国史志目录的主流，“所谓史志目录，乃是正史中用来揭示某一历史时期国家藏书之盛的综合性大型目录”^③。因此，从学术地位上看，正史艺文志体尊，记载具有权威性、传世性。宋代的徐侨曾赋诗《读艺文志》：

① 《汉书》艺文志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其书目包括书名、撰人、篇卷数，叙述包括总序、小序、书名下之小注；《隋书》经籍志分经史子集四卷，分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附卷轴数；《旧唐书》分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略卷轴，只记篇部，释道目录亦不附；《新唐书》艺文志含书名、卷数、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宋史》艺文八卷，编纂书名、卷数、小序及注撰人姓氏；《明史》艺文四卷，编纂书名、卷数、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录释道（含奏议类）。六本正史中《隋书》《旧唐书》曰经籍志者，其实质实为“艺文志”。

② 郭沫若. 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N]. 人民日报, 1959-04-08(7)

③ 王锦贵. 实至名归与名正言顺. 浅谈我对史志、方志概念的理解[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09(4)

“所存诸子少知名，自古陈编浩莫程。未说合神老成子，谁传谈易杜田生。到头法语那能废，终久浮言自不行。只向孔门详答问，正途坦坦甚分明。”表达了文人学者对正史艺文志作用的肯定和对其“正途”权威地位的认同。

艺文不仅是我国纪传体史书和政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地方志书的应有之义。古典文献学专家王欣夫先生认为：“志乘之列艺文，几乎是不可缺的项目。”^①从其编纂讲，方志艺文志与正史艺文志的编纂初衷是一样的，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目录学的角度来说，二者都是对文献的高位整合，前者承传地方文化的资源价值，后者存续历朝历代之文脉。“地方志乘，本是一地方的历史，与国史不过具体而微。国史有艺文志，所以纪一代的文献；志乘有艺文志，所以纪一地的文献。”^②所言切中肯綮。并且，经历代学人的传承和努力，方志艺文志在文化总体系的发展上，逐渐有了一套较为稳定的规制和成熟的评价标准，其远远超出文献目录的层次，与古文献学和古籍整理以及文化史研究的某些环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方志艺文志的起源来看，方志艺文志仿正史艺文志而来，最远可追溯到《汉书·艺文志》。这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长河中的久负盛名之作，是探究周秦、西汉学术文化源流演变的学术史名篇，方志沿袭《汉书》引艺文入志，并在参互钩稽其艺文之例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演绎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方志艺文志。方志艺文志的编纂同正史艺文志一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往今来，经历代学人的传承接力，已累积留存了一定数量的编纂成果。根据李濂镗所编《方志艺文志汇目》，仅1932年北平图书馆馆藏中国方志中所载之艺文志，就计有一千六百五十三部，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一卷，可谓博大精深。^③

可以说，正是有了方志艺文志，方志才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的统一，体现了方志的政教人伦价值。鉴于方志艺文志的意义以及方志艺文志的实际影响，我们在研究中对地方志艺文志的理解，就不能局限在通常意义上的把方志艺文志作为方志罗列的一个门类的狭义认识，而要做比较宽泛的理解。换言之，就是要放到其映像一个时代学术发展大势、揭示一地人杰地灵的文化

^{①②} 王欣夫. 古文献要略(讲稿上册)[Z]. 南京:南京大学中文系印;57—58

^③ 李濂镗《方志艺文志汇目》，国家图书馆收有缩微胶片。所载之艺文志，以书目为限，各志以省为次排列，共录十九个省，计一千六百五十三部，十三万八千五百七十一卷。各志均著录志书名称、卷数、艺文所属卷次、志书修纂时间及其他。

绪 论

发展的背景上,将其视为千百年来为中华文明提供了知晓地方文化成果的最佳识度方式和知解视角的载体。这才是方志艺文志安身立命的所在,也是本书确定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

编制方志,这几乎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定制,对艺文一门独立设志,是志书编纂的突出特点之一,也是一定时期一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再现。“历来史志学家最重视文字资料的艺文志或经籍志,这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现代中国的新编方志仍在一轮又一轮的进行中,然新编方志中只有极少数沿袭了设置艺文志这一做法。就是在对艺文独立设志或独立设篇章者,也没有比较好地继承艺文志编写体例、方法方面的好传统。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通过本书的研究,将这一现象放在社会历史的整体环境来综合考察,进行历史和文化层面的回溯、思考和研究并求得答案。

正史艺文志和方志艺文志在学术史上理应属于同一层位,可是当前学术界对于二者的研究重视程度是不同的。前者之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研究的重镇,相比较而言,先贤们对于后者的论述是零散和贫乏的,现代学术界对其研究也是非常薄弱,更谈不上系统全面的总结归纳了。因此,对于方志艺文志,不论是从理论的研究总结层面,还是对方志成果的开发和利用层面,都有必要将其作为特定的对象加以深入研究和探索。方志艺文志作为一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其在我国的方志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和景象?其对现阶段方志的编纂有着怎样的借鉴意义?这些问题将成为本书的主要研究方向。

究竟什么样的文献才是方志艺文志呢?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哪一部(篇)著作或论文对这一问题做出较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定义。因此对方志艺文志进行研究的前提,是必须对方志艺文志的内涵和外延有所界定,而界定之先,就必须对其赖以存在的母体——“地方志”,进行梳理并就其发展历史和发展脉络进行追溯和厘清。

我国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中独树一帜,在西方找不到和方志相匹配的文献类型。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方志与正史、家谱共

^① 傅振伦. 方志立文献刍议[M]//傅振伦方志论著选.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423

同构成了中华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它系统记载了一地古今的综合情况,成书多,史料丰,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笔宝贵财富。现存的全国八千多种方志,对于研究中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教育史、科技史等许多方面,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史学家顾颉刚总结地方志价值时指出:“夫以方志保存史料之繁富: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李约瑟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谈及了方志的独特价值,“伟烈亚力曾经写道,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方面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凡是熟悉中国文献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卷帙浩瀚的‘地方志’,它们确实是当地的地理和历史著作。其他各类文献在卷帙浩瀚的程度上很少能够和这类文献相比,它们是各地的学者长期以来辛勤工作而结出的硕果”^②。方志学家傅振伦也提出类似的见解,“在许许多多文化典籍中,地方志书发展很早,品类繁多,内容丰富,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③。可见,对于方志这一文献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和认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人和志家,可以有多角度的认识和丰富的阐释,见仁见智。他们的理解和判断虽各有千秋,但基本都在以下几点形成共识,即方志的起源早、史料丰,虽穷年累月历经时代变迁,却始终保持着核心的内容和独特的地域特性,它系统、连续、丰富,具有重要的功用和价值。以河南省编纂的志书为例,从春秋战国至民国,历代编修的地方志书累计达到两千种左右,且品类繁多,从通志、府志、州志、县志都有编纂,涵盖广,载述极为宏富,是研究中原地域的“博物之书”。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历代方志中的艺文部分,这些艺文志分布于各个行政区域的方志之中,以方志为载体,反映当地的学术发展和文运兴衰,记述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发展情况,是一种区域性的著作和资料的总汇,诸如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里志、村志、乡土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级的地方文献。在记述的范围上,反映全国内容者曰一统志,如元、明、清三代均有《一

① 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M]//李泽.朱士嘉方志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7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44—45

③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自序[M]//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3

绪 论

统志》；反映大行政区域者曰区域志，如隋虞茂修《隋区宇图志》；反映在两省以上者曰总志，如明徐学漠修《湖广总志》；反映在两县或两县以上者曰合志，如《常(熟)昭(文)合志》。

方志艺文志亦有一些别称，如有称坟籍志者，如《关东风俗传》；有称诗话者，如南宋《新安志》；有称文籍志者，如康熙《费县志》；有称集古者，如元延祐《四明志》；有称经籍者，如嘉庆《洛阳县志》；有称文艺者，如民国《岐山县志》^①；有称书籍者，如明《仁和县志》；有称诗文者，如明《交陟总志》；有称文章志者，如明《鄙陵志》；有称文略者，如明《滇略》；有称志贲者，如明《雍大志》；还有汇为一篇实艺文志而不称者，如嘉靖颜木纂《随志》^②。为求周延，方志中凡属上述名目者，皆为本书研究对象。

方志艺文志的内涵，是指构成方志艺文志内的基本元素，主要指其所选辑的畛域、设置、分类与编排等。如在选辑内容上，与正史艺文志只录典籍探讨的焦点集中在图书目录上不同，方志艺文志蕴含的史料较为丰富，其有的与纪传体史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相同，只录书目不录诗文的，如民国《钟祥县志》，有的方志艺文志是集录文学作品而不是书目，如清张高等纂修的《崖州志》；有记载书序的，如乾隆《大名县志》、嘉庆《广西通志》；还有诗文与书目并载的，如民国杨恩元、赵俏等纂《续遵义府志》，其艺文目载目录及诗文碑铭，再如民国《黑龙江志稿》艺文志载目录、文征。方志艺文志正是因为有了如此丰富的内涵和多样的元素，才能够全面反映和解读地域的文学文献概况、社会文化和历史思想等多元意义。

方志艺文志的外延，主要指其撰修艺文必然有所涉及的一些因素，如方志艺文志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脉络、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交互关系、各个时期主要方志的特点、成因以及数量、质量、收藏、存佚等。对于外延的研究，将有助于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了解方志艺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所映射的时代精神，感知其意义和价值所在。

在我国传统方志的发展历史过程中，艺文内容作为方志一种门类的客观存在，其主体价值至关重要。方志编纂要求志体“横排”，不可缺项，方志的类目一般包括了一地的建置、舆图、疆域、山川、名胜、物产、赋役、风俗、职官、人

① 这里作者还特别指出原因，“人物之盛，躬行为先，昔贤言行，有赖诗文，故次九曰文艺”。

② 这部志书分两卷，上卷编年叙事，下卷全录诗文，以代艺文。

物、金石、学校、灾异等,艺文与这些类目构成一个完整的方志。不仅如此,艺文在其文本内涵的背后有着超文本的深意,呈现的是在其价值层面的完整性。志书作为“一方之全史”,其各个类目之间存在着价值体系上的有机联系,它们不只是单独形式化的客观存在,或仅仅限于学科、主题等的客观不同从而使人们误读方志艺文志只是作为一个门类存在。如果只是从方志的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上划分和作为取舍标准,那么就会无视艺文内容的主体价值,反映不出各具体类目在整体文化的坐标体系中的映射位置和彼此关系,也就不能体味到我国传统文化的一般趋向,而导致在本质上和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有机联系相背驰。

列宁曾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尼采也有一句名言:“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②我们研究艺文志,离不开对当下的关心,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研究在中国方志编纂尤其近现代视野下方志艺文志的发展和嬗变,更让我们能真正理解方志艺文志编纂背后的学术和文化背景,反思目前我们编纂方志的问题,以及为现代新方志艺文志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策略,同时对推动方志艺文志的阅读和研究也有所裨益。因此方志艺文志的研究和编纂,不仅仅是一项学术研究的活动,同时也是对文化和思想领域的一次回顾。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总结出其具有价值的精神内核,并应用到我们新时代新志书的编纂中去,我们不仅要反对对传统志书的全面否定,事多而文省,又要避免沿袭旧法,复古、摹古而违反时代精神,还要不能流于画虎成犬,雕鵠类鹜。本书力求通过史料搜集等基础工作,结合中国现代方志艺文志的编纂实际,集百家之成言,考诸家之序论,从所挖掘到的科学方法以及总结出的前人的灼知远见中,探索出新方志艺文编纂的科学路径。

①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M]//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50

②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281

第一章 方志艺文志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方志

中国方志艺文志的母体是方志，二者可谓是鱼水关系，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对于探索和研究艺文志颇为重要。本节即就地方志追根溯源，阐述地方志发展历史梗概，以有助于解析方志艺文志的来龙去脉。

一、方志

方志即地方志。

方，地也，又称“方舆”。宋玉赋云“方地为舆，圆天为盖”，束皙诗曰“漫漫方舆，回回洪覆”，《淮南子》“以天为盖，以地为舆”。方志是“四方之志”的简称，所谓“四方”，指各省、府、州、郡、县、乡、镇、里、村等。

“志”与“誌”通，《说文解字》曰：“志，意也。”有意念之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志，古文识。识，记也……识，知也。”有识别、记载之义。《周礼·春官·保章氏》说：“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周礼·春官·小史》记载，周代曾设“外史”一职，“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郑玄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此处之“志”泛指的是记述的形式或体裁，反映的是方域之事或成文之作。直到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列“河渠书”，在史书中首述地理，并在广泛搜集先秦古籍资料的基础上，其“网罗天下放佚旧闻”里，进行了“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整理，并将当时发生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写进《史记》中，和《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方域、山川、物产等内容有共通之处，使后来志书和地理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所以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才使志书传世行远，代有相继，故司马迁有成就志体先驱之功。而明确把“志”作为一种文学或文章体裁的是班固，班固在司马迁《史记》之八书的基础之上，将《汉书》的十志加以扩展，凡一百篇，有本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记载内容上起汉高祖，下迄王莽，并曰：“太初以后，缺而不录。故采纂前记，缀辑所闻，已述《汉书》。”

第一章 方志艺文志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方志

中国方志艺文志的母体是方志，二者可谓是鱼水关系，方志的起源和发展对于探索和研究艺文志颇为重要。本节即就地方志追根溯源，阐述地方志发展历史梗概，以有助于解析方志艺文志的来龙去脉。

一、方志

方志即地方志。

方，地也，又称“方舆”。宋玉赋云“方地为舆，圆天为盖”，束皙诗曰“漫漫方舆，回回洪覆”，《淮南子》“以天为盖，以地为舆”。方志是“四方之志”的简称，所谓“四方”，指各省、府、州、郡、县、乡、镇、里、村等。

“志”与“誌”通，《说文解字》曰：“志，意也。”有意念之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志，古文识。识，记也……识，知也。”有识别、记载之义。《周礼·春官·保章氏》说：“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周礼·春官·小史》记载，周代曾设“外史”一职，“外史掌四方之志”。东汉郑玄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此处之“志”泛指的是记述的形式或体裁，反映的是方域之事或成文之作。直到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列“河渠书”，在史书中首述地理，并在广泛搜集先秦古籍资料的基础上，其“网罗天下放佚旧闻”里，进行了“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的整理，并将当时发生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写进《史记》中，和《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方域、山川、物产等内容有共通之处，使后来志书和地理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所以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才使志书传世行远，代有相继，故司马迁有成就志体先驱之功。而明确把“志”作为一种文学或文章体裁的是班固，班固在司马迁《史记》之八书的基础之上，将《汉书》的十志加以扩展，凡一百篇，有本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记载内容上起汉高祖，下迄王莽，并曰：“太初以后，缺而不录。故采纂前记，缀辑所闻，已述《汉书》。”

《汉书》是继《史记》之作并沿袭其体例而纂，虽无“世家”，但其“纪”“表”“传”都相同，且改《史记》之“书”为“志”，以避免和《汉书》之“书”字重复，后来方志大体上都沿用此例，沿袭“纪”“表”“书”“传”，记载大事采用本纪，记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采用书志，家谱、宗族采用表格序列，记载人物采用列传，并附有图谱。嘉靖《临颍县志》说：“志，史类也。藩省郡县，类各有之，以记时事，其所贵者在真焉而已尔。夫真则一方实录，足备采择，以征文献，故信史也；否则，浮诞失实，辞藻虽工，无所于征，奚以志为？”^①民国的熊斌说：“班书始有十志，释曰，志，识也。谓积记其事也。”^②学者们还在就方志的“名”与“实”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清晰表达的基础上，进行了具体的辨析，刘知幾说：“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

后来，方志之称谓代有沿袭，其内容和体例逐步成型，并发展成为以行政区划为范围载一地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物、艺文等事项的综合记录一地事物的志书。方志编纂成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和官府政事，晋左思《三都赋》云“方志所辨，中州所羨”“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又说：“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③

我国的传统方志，除大多数冠以“志”名外，还另有许多称谓：“书”，如《越绝书》；“经”，如晋挚虞《畿服经》；“记”，如晋张勃《吴地记》；“图经”，如唐《沙州图经》；“录”，如宋程大昌《雍录》、高似孙《剡录》；“传”，如刘宋吴据《襄阳耆旧传》；“略”，如明毛凤韶《浦江志略》；“乘”，如元于钦《齐乘》；“谱”，如宋杨备《思平郡谱》；“考”，如清冯苏《滇考》；“集”，如明崔桐《海门县志集》；“编”，如清赵宗藩《盐亭县志续编》；“簿”，如东汉《会稽贡举簿》；“文献”，如清张园真纂《乌青文献》；“览”，如民国项元勋《临海要览》；等等。

二、方志的起源

关于方志的起源，学术界历来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从源头的多寡来

① 嘉靖《临颍县志·序》

② (清)熊斌序[M]//王俊让,王九皋纂修.府谷县志.石印本,1945(民国三十四年)

③ (清)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M]//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